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参考资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些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介绍

一九七四年五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謀詭計。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爭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历史告訴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爭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爭。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爭的有害的倾向作

斗爭，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設和革命战爭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資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資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資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張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資本主义路线。在現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現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说　明

为了配合我系工农兵学员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翻印了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编印的这份资料，供内部学习参考。

目　录

蒲鲁东……（1）
巴枯宁……（13）
拉萨尔……（34）
杜　林……（48）
伯恩施坦……（53）
考茨基……（72）
普列汉诺夫……（89）
波格丹诺夫……（97）
托洛茨基……（109）
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
白劳德……（⋮）
陶里亚蒂……（⋮）
赫鲁晓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始祖。

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省的一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由于家境困苦，他在少年时代就停学而独立谋生，当过旅馆雇工，做过排字工人，后来他和友人合伙开办了一个小印刷所。1837年蒲鲁东以《普通语法试论》一书获得了贝桑松大学的一笔助学金后，迁居巴黎，从事理论著作活动。

1840年，蒲鲁东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对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得出了“财产就是赃物”的结论。这部著作出版后轰动一时，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但是蒲鲁东在这部著作里是以法国小农的立场和眼光批判现代资产阶级财产的，而且对问题提得非常错误，他不是从生产关系而是从法学角度，即从权利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因此，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

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时和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他们常常整夜争论。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5月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担任驻法通讯员并参加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讨论。5月17日，蒲鲁东回信说明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在信中说："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他说只要通过经济的组合，就可以"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在目前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马克思接到回信后确信同蒲鲁东的意见有根本分歧，放弃了通过蒲鲁东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

1846年蒲鲁东写成并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在这本书中，蒲鲁东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规律作了反科学的解释，宣扬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矛盾地位和两面性，在蒲鲁东的这本书中集中而明确地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写信给巴·瓦·安年科夫，信中批判了他刚刚读完的《贫困的哲学》，同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坏书，它的出版将给工人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害。1847年夏天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揭露了蒲鲁东的观点的反动实质，给《贫困的哲学》以致命的批判，由此，他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页）

1848年以后，蒲鲁东开始根据他的改良主义理论从事社会改革活动和政治活动。1848年他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革纲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他主编《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鼓吹他那套

社会改良计划，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长。6月法国国民议会补选时，蒲鲁东当选为巴黎代表，参加议会。7月底在国民议会上提出了要求改革税收制度并组织无息信贷的主张。1849年蒲鲁东发表文章反对总统路易·波拿巴而被判处三年徒刑，在狱中他继续文字政论活动。1851年他发表《十九世纪革命思想》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敌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852年他发表了《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表示赞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马克思指出这个著作**“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后来，蒲鲁东又批评波拿巴保护大资本家，但他没有提出要推翻波拿巴制度，只是鼓吹有利于第二帝国的政治冷淡主义，劝诱工人不要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工人应该象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不去打扰政府，而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继续反对工人运动，**“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0页）。1858年蒲鲁东再次被判处三年徒刑，这次他逃亡到比利时。

晚年，他还写了《一个革命家的自白》等著作。蒲鲁东在他最后一部著作里，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辩护，**“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蒲鲁东死于1865年1月19日。

几天后，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请求，写了《论

蒲鲁东》一文，批判了蒲鲁东，对他的一生作了盖棺论定。

蒲鲁东是个唯心主义者，他是应用黑格尔的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但是他保存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庸俗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把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看作是永恒存在的观念和范畴的体现。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时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由于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所以他总是“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页）

蒲鲁东歪曲辩证法，把任何东西都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胡说任务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这样，现实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都被他说成不过是“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相互矛

盾。因此，他反对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企图调和矛盾，用改良的办法去掉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

马克思深刻地揭露说：“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蒲鲁东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的。他攻击资产阶级大私有制，却竭力维护小私有制。他认为私有财产的普遍化是社会幸福的基础，所以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他认为解除贫困的方法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恢复和保证独立的小私有者地位，所以他反对并攻击共产主义。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祸害的根源是货币，他企图消灭货币，保留商品生产与流通，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交换同量劳动的工人，使人人获得平等与自由。他提出了否认劳资矛盾，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妄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消除资

本主义祸害的社会改革计划，幻想通过协助工人发展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政府的新社会。他的具体方案是由小生产者和工人集资建立“交换银行”，一方面用它来改革和组织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即由银行收购一切商品，发给生产者一种证券作为劳动货币，凭以取得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他认为这样使小生产者不经过资本家而直接交换产品，不受中间剥削，就可避免贫困和破产，给社会带来平等。另一方面向合作社，向工人和小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帮助他们建立私人企业，使他们都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为了实现他的改革方案，1848年他着手组织“人民银行”，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介绍说：“我在着手办理一个空前绝后的企业。我想把社会的基础变换一下，我想把文明的轴心翻转过来，我想这样作：宇宙是按照神的意志从西往东转动的，我要使他按照人的意志开始从东往西转动。我想改造资本对劳动的关系。”他计划“人民银行”的资本为500万法郎，分100万股，每股五法郎，银行将实行无息贷款。一时蒙蔽了不少劳动群众，加入的股东达12,000人。1849年2月11日宣布成立，但并未开始营业，3月底蒲鲁东被判徒刑，他在4月12日宣布关闭“人民银行”，中途流产，这使它幸免于在实践中必然彻底破产的下场。马克思指出：**“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蒲鲁东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8页）恩格斯在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集会上谴责蒲鲁东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会改革计划只是梦话，除非用月亮的银光，铸造一个个五法郎的硬币才能实现蒲鲁东的梦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58页）。

蒲鲁东的理想社会不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他幻想用改良主义方法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而保留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一切条件，**“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第53页）由于蒲鲁东实际上幻想建立的正是这样一个不要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又把他列入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行列。

机会主义者蒲鲁东极端仇视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欧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勇斗争，当时蒲鲁东却顽固反对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和进行罢工，反对工人为提高工资和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他认为这些斗争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工资的提高将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交换的普遍混乱，社会贫困更加剧烈。他甚至说：“工人罢工是违法的。”马克思批判他这种谬论时指出：**“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普遍提高工**

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4页）何况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降低工资水平，“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工人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不仅是为了反对降低工资水平，而且也是为了促进工人的团结，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如果工人不进行这种斗争，“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针对蒲鲁东敌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忘记，日常的经济斗争“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所以“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工人阶级在反资本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团结起来形成自为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引用乔治·桑的话说：“不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早在《什么是财产》中，他就说什么“人统治人的制度是压迫，具有最高度完善

的社会存在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的结合之中”。他认为国家和政权是危害自由和个性的东西，主张“把政权和垄断一齐打倒。”在《革命家的自由》中，他声称“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的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因此，他说：“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忠实誓愿”。他这些谬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格言。蒲鲁东鼓吹反对一切组织、政治制度和国家，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用个人和集团的自由联合来代替国家，充分反映了他及其信徒妄图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因此他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只是为反动派效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7页）蒲鲁东还重复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诽谤，恶毒诬蔑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个性，限制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力图证明似乎只有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才能使社会获得发展。在个人与群众关系的看法上，他也是根本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蒲鲁东的思想观点，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流行相当广泛。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影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工作的开展，危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深刻的批判。

在蒲鲁东死后，他的信徒在第一国际内部进行宗派活动，借口不应接受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妄图排挤马克思和恩格斯，篡夺国际领导权；他们猖狂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鼓吹社会改良；他们建议把国际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交换合作社，提出什么“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坚持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妄图用机会主义路线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构成第一国际第一时期（从1864年国际成立到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中心活动。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战胜了蒲鲁东主义，揭穿了他们搞宗派活动的阴谋，击败了他们反对政治斗争的谬论，粉碎了他们妄图永远保存小私有制的幻想，扩大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阵地。蒲鲁东主义者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逐渐抛弃旧的观点，向革命方面靠拢。

但是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蒲鲁东主义虽然被粉碎了，而它的机会主义观点不可能一下子肃清，仍然继续危害工人运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公社领导成员中有不少是蒲鲁东主义者，至使公社未能摆脱机会主义的祸害。公社在经济方面的措施，**“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法兰西内战》

第10页）公社的经验教训，却是对蒲鲁东主义的无情批判。恩格斯指出：**“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法兰西内战》第10页）

1871年德国实现了统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独立的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从法国掠夺来的割地赔款，是德国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急性病似的住宅缺乏现象”**，促使**“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蒲鲁东主义者米尔伯格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利用这个问题让德国工人领悟一下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0页）写了一系列文章，贩卖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观点。针对这些文章，恩格斯在1872年写了《论住宅问题》，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恩格斯指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页）因为，蒲鲁东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极力主张开倒车，妄图恢复小私有者失去的天堂，返回到旧日的手工劳动上去。这，实质上是使**“整个人类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1873年为了**“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54页），马克思写了《政治冷淡主义》、恩格斯发表了《论权威》的重要论文，彻底批判了无政府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消失。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现在**

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对他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比利时，“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水平。”“在西班牙，象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总之，“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1—462页）

蒲鲁东主义虽然早已被埋葬，但是他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反对社会革命，鼓吹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过渡等机会主义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为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继承，今天重新加以批判，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谁要是稍为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早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